

● 吴 江 牛旭光 著

民主与政党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MINZHUYUZHENGDANG

民主与政党

吴 江 牛旭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 贾铁燕
封面设计 李贺然
版式设计 任志珍
责任校对 李 灵

民主与政党

吴江 牛旭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北下关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9.625印张 245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册

ISBN 7-5035-0350-5/D·177

定价：4.70元

目 录

第一章 当前民主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1)
第一节 提到我们面前来的问题	(1)
第二节 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5)
第二章 资本主义政治民主与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	(22)
第三节 英国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和政党制度	(23)
第四节 美国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和政党制度	(42)
第五节 法国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和政党制度	(58)
第三章 资本主义政治民主述评	(80)
第六节 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历史地位和历史 作用	(80)
第七节 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阶级实质	(96)
第四章 当代世界政党政治大势	(115)
第八节 政党涌现的一个高潮	(115)
第九节 当代世界的主要政党	(117)
第十节 当代世界的政党制度	(134)
第五章 苏联的政党与政党制度概述	(141)
第十一节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政党情况	(141)
第十二节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建立 多党联合政权的尝试	(144)
第十三节 苏联的一党制	(147)

第六章 中国政党及政党制度的发展	(151)
第十四节 中国政党的兴起，孙中山的建党活动 和建党思想	(151)
第十五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两党的合作 与斗争。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建立 与结束	(174)
第十六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200)
第七章 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若干问题的 讨论	(226)
第十七节 何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226)
第十八节 国家权力的配置与运用。兼评以党 代政现象	(243)
第十九节 中国民主党派的性质及其活动方式	(255)
第二十节 建立稳定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秩序	(268)
附：中国民主党派简介	(282)

第一章

当前民主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一节 提到我们面前来的问题

我们从1978年起进行拨乱反正，接着开始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从此，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社会主义新时期，自然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提出新的要求。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系成为现实生活中、改革中的突出问题之一。这里又是一个充满着争议的领域：有人认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同步”进行，（“同步”一词我们打上引号，因为看来这不是科学语言），甚至认为政治改革应当是先行官；有人认为经济改革不一定以政治改革为先行条件，相反，一开始就着重抓政治改革是不可取的，因为经济改革需要在政治上有某种控制，因此首先要有一个稳定的政局，而政治改革，尤其是不深思熟虑的政治改革，则容易造成政局的动荡，反而于需要稳扎稳打的经济改革不利，有人则在政治改革和政局稳定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点，以便两者可以兼得。对于政治改革本身又提出种种的问题，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是关于民主政治与政党制度的问题，关于改善政党政治的问题。

从政治民主化这个角度出发，关于公民的权利，关于参政议政，关于法治与人治，关于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等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谈论较多的是关于“多元化”的问题——经济多元化，利益多元化，思想多元化，政治多元化等，“多元化”已成为一个时髦的政治术语。当然，这也是从国外传来的。本来，

“多元化”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并不一概否认“多元化”现象的存在。但是，目前这样那样关于“多元化”的议论最后归结到了“政治多元化”，从“政治多元化”又得出必然形成西方式多党制的结论。一些论者把政治民主化——政治多元化——西方式多党制这几样东西紧密地排列在一起，甚至划上了等号。

大家知道，我国除执政的共产党以外，还有多个民主党派存在。我国从建国开始就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共产党宣布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实行的既不是西方的多党制，也不是社会主义一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即多党合作一党领导的制度，是政党制度上的一项创举。它和西方某些国家的“多党共存，一党独大”的制度自然也不相同，不仅性质不同，关系、形式也不相同：一为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合作关系，一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关系。但是，就目前情况来说，我们的政党制度尚属初创——虽然已经有了40余年的历史，但它无论在理论上和具体制度上，都还不够完善，不够完备。因此，现在提出完善与发展这一制度是完全合理的，也是我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目标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完善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正当呼声，在有些场合，在有些人那里，却有意无意地、或明或暗地同多党制的主张混淆在一起。特别是，有人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一党领导”的原则表示怀疑。例如，有人说：“按照政党学说，说一个党处于领导地位，是说不通的，这样容易搞成‘父子党’。甚至说：“搞民主革命，武装斗争，共产党的领导资格没有问题；如今搞经济建设靠的是智力，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就是另一回事了”。有人认为，应把引进现代政党体制（指西方多党制）作为当前政治改革的重要任务。据此，有人提出：“我们的多党合作，应是多党联合执政，大家都处于平等执政地位”。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多元化必然造成

政治的多元性，必然导致政治上产生新的政治集团与政党，因此要研究出现在野党和反对党的可能性，至少应效法西方确立“合法反对派”原则。

现在，共产党也好，民主党派也好，都处在成员与领导人的新旧交替之际。这种新旧交替在一定意义上为各党肌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一位颇熟悉中国民主党派状况的寓居香港人士曾撰文评论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工作，他说：“建国以来各民主党派未能坚持独立自主……这是一个政党的生命线，也缺乏对国家命运勇于负责的精神，对于中共歌功颂德多，批评针砭少。”他认为这是丧失了作为政党所应有的政治功能。对此，他寄希望于民主党派中的中青年新成员。他说：这几年各民主党派增加了不少新成员，“这些人士大体上可以算是民主党派中的‘少壮派’，其中不少人士应当说是民主党派的‘新生代’。这些‘少壮派’或‘新生代’与老一辈民主党派人士不同之处是血气方刚，现代民主意识强烈，头脑里框框和忌讳少，比较敢于直言……现在，各党出于为现代化做贡献的良好心愿，凭借其成员多为知识分子这一有利条件，积极举办社会教育事业，也做一点专业咨询工作。这些工作固然有益于社会，但并不属于一个政党的功能，他们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类似社会团体所做的事情”。作者提出期望道：“在大陆加速改革和深化改革的历史新时期，民主党派是不是也有可能重新振作起来，恢复活力，探索和开拓一条走向新生的道路，从而对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建树做出一份贡献。”

这番话表明，各方面人士对于祖国的民主政治、政党制度，对于民主党派是很关心的。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特别是新成员，确有较强烈的“政党意识”、“自主意识”、“参政意识”、“竞争意识”，期望自己的党能够独立地发挥政党的功能，并且要求在宪法和法律上明确规定民主党派的地位。但是他们未必能够真正地完全地懂得：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具有何种特点？社会主义应当创造出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才有利于推动社会前

进？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们面临着各种复杂的形势。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处、对峙，局势时而紧张时而缓和。在目前采取武力对抗将付出高昂代价的情况下，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就日益成为角逐的决定性因素。西方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公开指出：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非武器。因此，他主张开辟“思想战场”，大力宣传资本主义的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并以大量资金和现代技术用于意识形态的竞争，特别提出要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机会在各种政治力量中寻找“合作者”。最近东欧国家的政党制度发生突然演变的事实，似乎向人们证实了出现这样一种前景的可能性。

无庸讳言，这种复杂因素势必影响到我们的民主化进程。要求民主自由，自然不能认为是否定党的领导或否认社会主义。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本身要求实现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民主自由。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没有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或者对民主自由表示恐慌万状的社会主义，决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说实在的，由于种种客观条件（文化的、经济的、封建残余等）的限制，加上某种主观因素，我们的民主自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而改革开放将激起人们的民主化热情，这几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趋势。政治民主化正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的目标。因此，问题决不在于要不要民主自由，或者允许不允许提出民主化的要求，而在于：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要什么样的自由，并要达到什么样的实际效果。首先是民主化的方向问题、价值观问题：是社会主义方向还是资本主义方向？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还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其次，这种民主化是有利于促进政局稳定还是使政局陷于动荡，制造混乱的局面？这是两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事实证明，处于各种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民主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严肃地慎重地对待它，既急躁不得，也天真不得，要避免犯“民主狂热病”。期望一个早晨实现

“高度民主化”。此外，我们认为还需要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对待民主，不仅要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而且要研究由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东方政治与西方政治的区别，研究有最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政治的传统。与他国的历史不同，中国的历史更具有亚细亚东方的特点。“五·四”以来人们从书本上舆论上接受的主要是西方政治学的知识（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确实是从西方开始的，从亚里士多德这位希腊名人开始的），而中国的政治学者几乎很少有人去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然而，单凭着一点西方政治学的知识，而不懂得中国的政治传统，不顾中国经济文化的现实条件，或者只有“西方意识”而没有东方人和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是根本无法创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不是西方政治的延伸）的民主化路子来的。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摆着许多必须弄清楚的问题。就民主与政党方面来说，必须弄清楚政党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弄清资本主义民主及其政党制度的性质、来龙去脉、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弄清当前世界政党政治的大势，特别要弄清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性质、现状及其变化发展，弄清我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由来、特点及发展中的问题，等等。

下面，我们就以作者与访问记者对话的方式，并提供有关的历史和现实资料，试图对上述诸问题约略加以说明，提出我们的意见以供有兴趣于这些问题的同志们共同讨论。

第二节 政党在民主政治 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就政党与民主问题同记者的对话。

记者：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化本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何况又

插入一个政党问题。有人把政党政治看作民主政治的前提，或者把政党政治与民主政治直接等同起来，提出“政治多元化”必然产生政党多元化。也有人说，中国应引进西方的政党制度。请谈一谈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作者：这确是政治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改革提倡探索，自然不免放言高论。我对政党问题没有研究，只是最近有所接触。我想问题还是要从民主本身谈起，从近代民主谈起。

记者：你是想说政党现象是近代民主的产物？

作者：撇开遥远的“原始民主”不谈，民主可分为古代民主和近现代民主。近现代民主又分为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科学、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这五种东西是近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内容。政党现象，一般说，是从属于民主的，或者说是近现代民主政治的内容之一。至于政党产生以后，不仅民主力量、革命力量运用它从事斗争，就是某些反动的、反民主的势力也利用政党作为斗争的手段，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民主本身也好，民主学说也好，其发祥地是欧洲。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雅典就有一种以公民大会为城邦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政治体制。那里的执政官已由世袭转为由选举产生，终身制转为任期制，贵族会议与公民大会并存，并在司法上实行陪审员制度。这些，在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被称为政治学的奠基者）的学说中就有反映。欧洲中世纪，在反动的封建制度的缝隙中，在欧洲一些沿海地区和商业贸易中心（如威尼斯、热那亚等地）也出现过一些城市共和国，它们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古代民主的某些形式，当然这是作为特例，并不构成封建政制的有机部分。但是这些古代民主并没有产生政党。

记者：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过“共和国”、“公民大会”之类的东西，却久有“朋党”、“党羽”之称。

作者：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难找到与“民主”相当的思想，却有“民本”思想可循。从古代禅让的传说起，古籍中多有“民

视民听”、“民贵君轻”、“利民”、“便民”、“为民作主”等说法，但这些说法中的所谓“民”都被当作统治与惠授的对象，与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主义之“民主”绝非一事。有的古籍如“尚书”偶而出现“民主”一词，但其含义恰恰与我们所说的民主相反，作“民之主”解，意指“统治者”。所以中国长期的古代社会，包括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没有出现过任何一种民主形式。直到今天，还有相当多的人包括不少领导干部，他们高谈民主，实际上仍停留在“民本”思想的水平。中国近代民主的思想是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衰落解体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而逐渐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的。清朝末年，就有一些早期维新思想家如崔国因、郭嵩焘、郑观应、康有为等提出开议院、设议郎之议，但那时并没有人出来倡议组织政党。在中国组织近代政党还是孙中山先生首开其端。

至于中国古代“朋党”之称，虽也有“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区别，但多数场合下都是贬称，含“朋比为奸”之意。所以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互相指责对方为“朋党”，如唐朝有所谓“牛党”、“李党”，宋朝有“天祐党”、“元符党”，明朝有“东林党”。这里并无政党的含义。古希腊、古罗马也曾有过所谓“贵族党”、“平民党”、古代意大利有“教皇党”，甚至有所谓“皇帝党”。这些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现代政党一词是从外文移植过来的，意指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公开提出纲领和自己为之谋求的东西。这种社会政治组织是近代经济、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记者：可否谈得具体一点？

作者：大体说来，产生近代政党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经济利益日益分化，利益冲突和阶级冲突（包括同一阶级内部的利害冲突）日益明显并公开化；二是，人们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有了日益增强的主体意识，有了为自己的利益而干预权力的强烈欲望。在欧洲，近代民主思想是从文艺复兴

时期开始的。那时，人们开始以“自我”、以“主体”来对待世界上的一切，来追求自己的权利。所谓“实现自我”，就是那时提出的口号，也就是要争取人权。一位哲学家说，“人的主体性就是人权”，这话是有道理的。人们要求摆脱一切外来权威的统治，不满足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近代民主就其一般内容而言，是主张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自由则以法律形式加以界限，避免社会的无秩序状态），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国家保障公民的平等地位。近代民主制度多是指公民通过选出的代表行使国家权力，并行使权力对权力的制约。这种民主制度最初的实现形式，就是在欧美出现的代议制，即以议会为核心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由一系列原则（如选举制、任期制、少数服从多数等）、规则和措施构建出一种政治体制；同时，崇尚法制，以法制来规范和调节政治生活和各种利益。最初的政党就是在这种议会民主的基础上产生，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资产阶级各部分通过政党运用选举等手段来影响或支配国家权力，为自身的利益服务。

记者：政党的出现是否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走上轨道？

作者：英美曾经是这样。最初的议会有个发展过程：开始通过反君主制斗争，只是初步确立一些民主原则。在议会制形式下，最初出现的还是有权威的寡头统治，贵族和军人还有很大的势力，民选国会的权力倒不大。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到19世纪末，美国从独立战争到19世纪30年代，大体都处于一种寡头统治的状态，或贵族议院主政的时期。其后，出现了政党，出现了多党和两党轮流执政，出现了责任制政府，才算是有个近代民主政治的样子。

记者：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是注定不可分的吗？有没有“无政党的民主”？

作者：政党出现时曾遇到强大的反对势力。反对的力量自然首先是没落的王权保守势力、旧的寡头势力，他们害怕政党活动

威胁自己残存的地位和利益。其次，是某些政府的行政官员，他们认为政党你争我夺，破坏合理的秩序。还有是一些具有民粹主义思想或卢梭式直接民主思想的人，他们虽然认为人民应当参与政治，但用不着组织政党，政党使少数人操纵权力，反而妨碍人民普遍意志的实现。此外，有些著名的民主主义者也反对政党，例如华盛顿。

记者：你是指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

作者：是的。华盛顿连任两届总统后表示不再干了。在他著名的《告别演说》中，曾有这样一段话：“政党总是干扰公共议会的工作，削弱行政能力。它用毫无根据的妒忌和虚假的恫吓把社会群众激动起来，使共同体处于不安之中，唆使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有时还煽动闹事和暴动。它还外国势力和腐化打开了大门，外国势力通过政党热情的途径发现了接近政府的方便之道。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属于另一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华盛顿明确地告诉国人：“政党精神对美国政治制度具有有害影响。”当然，华盛顿所指责的东西，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

记者：这段历史倒鲜为人知。

作者：如果你留心当前国际事务的话，华盛顿当年对政党的指责，诸如削弱行政效率和助长腐化，使社会分裂，制造政治动乱，为外国势力的渗透提供方便等等，今天同样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领导人口中听到。宗教领袖和像塞拉西皇帝那样的人不必说了，就是像哈雅布拉卡什·纳拉扬和纳赛尔那样的政治人物也否认政党的必要性，认为政党对现代民主政治不起好作用。现在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中大概只有十几个小国没有政党。

华盛顿反对政党是有他的理由的。美国的政治制度虽然受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早期产生的政治制度的影响，但美国政党政治的实际形成却早于英国，这与美国革命首先是从外国统治下争取独立有关，这种独立战争要动员广泛的人民参加，这就促使动员群众

参与政治的组织产生。早在独立战争前，美国就有秘密的政治组织，革命危机时期创立了具有政党雏形的通讯委员会，18世纪末出现了最早的政党（一个叫联邦党，一个被称为反联邦党，反联邦党后来发展为民主共和党，民主共和党后来又分化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它们在权力竞争中，用五花八门的手段动员选民参加选举，蔚成政治奇观。至今在美国选举中仍沿用当时通行的某些作法，如参加竞选的各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一个选区一个选区地组织自己的选举班子和选举队伍，建立选民登记，立选民档案，设立专门委员会挨家挨户游说筹集资金，动员富裕的党人慷慨解囊（这些出钱的豪富自然获得好的政治报酬，或者成为后台老板），组织集会，同竞争者公开辩论互相揭短，并周密布置投票处工作，千方百计引导和控制选民投票，等等。美国这种政党活动自然不免出现华盛顿所指责的种种弊端，这是华盛顿厌恶政党活动的主要原因。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华盛顿是唯一的无党派人士。后来华盛顿坚决不再继任总统，恐怕也同他厌恶政党活动有关。同后来欧洲出现的强大的政党相比，美国的政党一开始就表现出组织松懈，缺乏纪律，缺乏凝聚力，几乎等于一架富人操纵的选举机器，在政府中的实际功能也很差。

记者：但是世人特别是一些年青人往往把美国的政党政治看得很神圣，仿佛是政党政治的正宗。孙中山先生似乎也很欣赏美国的政党政治。

作者：对于美国的政党政治，世人往往只看到其表面、而对于孙中山先生则往往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你是否留心，民革中央办的《团结报》曾就孙中山先生对政党的态度展开讨论。开始有人写文章，阐明孙中山先生认为像英美那样的政党政治是革命党人所应追求的目标。他引孙中山的话说：“是故政党政治，虽为政治之极则，而在国民主权之国，则未有不赖之为唯一之常轨者。”孙中山赞扬英美的两党制政治是“世界上最完全之国”，并希望中国能以“英美先进国之（为）模范”。孙中山认

为“一国之政治，必赖有党争，始有进步”，“盖党争绝好之事也。须知所争者，非争势力，乃争公道。”

后来该报又发表一篇争鸣文章。这篇文章承认孙中山在其政治活动的初期直至辛亥革命后一个时期确是这样看的。辛亥革命后有了《临时约法》和国会，当时出现的众多政党也经过了合并，展开议会活动，孙中山便认为“合众政府”的政党政治已经建成，在中国，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已实现，只剩下民生主义的任务了。殊不料，孙中山这一认识很快为事实所否定。强大的封建势力马上向软弱的民主力量发起反攻。本来在国会中居第一大党的国民党不久被袁世凯强令解散，国民党人作鸟兽散，有的甚至直接为袁世凯帝制效劳。孙中山于1914年另组中华革命党，1919年又重建中国国民党，并发起护法运动，但又因内部分裂而告失败。1918年段祺瑞组织“安福议会”，许多议员“伪庭卖身”。1923年曹锟又贿选总统。至此，孙中山认识到，“现在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各国实行这种代议政体都免不了流弊，不过流传到中国，流弊更不堪问罢了。”又说：“我们所主张的民权和欧美的民权不同，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他主张“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这时孙中山对欧美式的政党政治可谓已经绝望了，认识到西方那种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政治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说“现在在中国既是定名为民国，总要以人民为主”，“由民众发之，由民众成之”，企图寻找一种以人民代表制议会取代政党政治代议制的国家政体，以实行直接民权亦即他所说的全民政治。最后，他的目光投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并惊喜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近来俄国新发明一种政体，这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这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

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①

记者：但是孙中山先生并非否定政党，也不能认为是否定代议制，他只是否定“为资产阶级所专有”并为资产阶级政党所操纵的代议制。他设想中的“全民政治”议会第一步大概相当于国民代表大会制，他称之为“直接民权”，政党仍在其中起领导和组织的作用。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作者：我看可以。孙中山先生不像华盛顿那样简单地否定政党，但他的确认识到政党应当代表人民，这大概就是后来提出国民党应当联共、联合工农、大批吸收工农成份的主要原因。

我们再返回来说。产生政党是历史的必然，不是谁不喜欢政党，政党就不存在。近代人民日益增强的民主意识，在阶级社会中，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政党就成为动员和组织属于一定阶级、阶层或一定社会集团的成员参与政治的一种形式，当然也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恩格斯在回顾第一个工人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形成时说：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②列宁也说过这样的话：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完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政党就是以取得政权和维护政权为主要目的的政治组织。当代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广泛地利用政党这一武器。自然，大家也不会忘记，德国法西斯也是借助于政党开展自己的活动并通过竞选获得政权的。现在世界上的政党五花八门。有的政党有纲领，有较严密的组织，有的政党既无纲领，也无严密的组织。也有的政党只是集合了一些野心分子，进行权力的角逐，并无什么政治理想，他们的领袖也不时在各党之间转来转去。有的

^①以上分别见《团结报》1988年12月27日所载《孙中山先生的“政党政治”论》和1989年2月11日所载《孙中山的“政党政治”论质疑》两文。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2页。